

《危機中現轉機：晚清廣府移民與國家》探討晚清西江流域在戰亂與重建時期廣府移民的歷史，以及這些發展對國家與廣西邊疆地方精英關係的影響。麥哲維把廣府人遷居西江上游和移居海外置於同一研究框架中，重新界定晚清是廣府人離散擴張的時期，而並非單是國家衰落的階段。

本書以危機作開場白，追溯 19 世紀時期針對廣府人河川商業且逐步升級的暴力。而這些暴力大多來自四處流動的下層社會。作者然後敘述了一個在太平天國時期，由廣府人在廣西建立的反清政權。接下來的章節會討論這個危機所帶來的轉機及後果，並闡述橫跨 19 世紀中葉前後重要的持續性發展和轉變。在清政府恢復統治廣西後，廣府人在廣西的商業網絡急速地擴張並逐漸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依靠著湖南人和廣府人收服廣西，清政府允許這些移民群體以較為靈活的方式成為廣西省政府的官員以及管理當地科舉制度。在中國從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的前夕，這些政策均有利於重建廣西當地的政體。

危機中現轉機

晚清廣府移民與國家

麥哲維 (Steven B. Miles) 著
傅珮琳、袁曼端、陳榮彬 譯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https://hkupress.hku.hk>

© 2025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876-94-5 (平裝)

版權所有。未經香港大學出版社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製或通過信息存儲或檢索系統，複製或轉載本書任何部分。

Opportunity in Crisis: Cantonese Migrants and the State in Late Qing China, by Steven B. Mile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21. Copyright © 202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危機中現轉機：晚清廣府移民與國家》，麥哲維（Steven B. Miles）著，於2021年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首次出版。版權所有 © 2021 哈佛大學。經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許可翻譯和發行。

10 9 8 7 6 5 4 3 2 1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圖次與表次	vi
致謝	vii
致讀者	viii
緒論	1
第一部分：碼頭之上，陰影之下	
第一章 19世紀初的精英與下層社會	19
第二章 兵燹頻仍的上游地區（1848-1858）	58
第二部分：1850至1890年代的延續與變化	
第三章 扭轉乾坤：廣府人在廣西官場建立的一席之地	99
第四章 源源不絕的利潤：擴展及調整廣府商業網絡	140
第五章 流動的聲望：科舉考試與廣府宗族	176
第三部分 時代終結之際的迴響	
第六章 一位來到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買辦	213
第七章 三合會與電報：柳州兵變及其後續影響	235
結論	244
參考文獻	251

圖次與表次

圖次

地圖一：廣東和廣西	4
地圖二：珠江三角洲	13
地圖三：王亞喜在廣西北部的活動範圍	20
地圖四：19世紀初廣府會館與廟宇的所在地	24
地圖五：雒容縣的劫船案件	32
地圖六：西江河盜的活動地點	60
地圖七：效忠清廷的人士進行戰爭活動的地點	72
地圖八：劉長佑麾下幾位廣府千總的活動地點	110
地圖九：19世紀中葉戰亂過後廣府人在廣西的部分商業活動中心	143

表次

表一：在廣西出任縣級或州級佐雜官的廣東人（1788-1870）	116
表二：在廣西出任縣級或州級佐雜官的廣東人（1877-1897）	117

致謝

感謝兩廣各城市村鎮的居民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全賴他們對我這名陌生人的熱心相助，本書才得以出版。非常感謝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和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費心閱讀本書原稿，並提出相當精闢的意見，讓我受益匪淺。此外，哈佛大學亞洲中心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的黛博拉·德爾·蓋斯 (Deborah Del Gais) 和羅伯特·格雷安 (Robert Graham)，以及石墨編輯 (Graphite Editing) 的山形亜紀子 (Akiko Yamagata) 也合力讓本書更上一層樓，並在出版過程中提供不少協助。

本書的研究和撰寫受益於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所提供的美國對華人文研究獎助金 (American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Fellowship)，其中的資助機構為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 (ACLS)。此外，本書亦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研究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的獎助。本書所發表的觀點、發現、結論及建議並不代表美國國家人文研究基金。

最後，一如既往，感謝琳玲無窮無盡的耐心與支持。

致讀者

中國農曆年橫跨公曆的兩年。提到特定農曆 a 年發生的事件時，若我不清楚當時的確切日期，便會使用斜線 (/)。舉例而言，若某人在道光元年（公曆 1821 年 2 月 3 日至 1822 年 1 月 22 日）獲任命為融縣知縣，我便會寫作 1821/1822 年。此外，若提及任期橫跨兩年的知縣，例如是 1821 年 5 月 1 日至 1822 年 10 月 10 日，我便會把任期寫為 1821–1822 年。

我會在註腳以縮寫表示年號，並以數字表示年次、農曆月份和日期，例如 DG12.8.26 代表的是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書中有幾個城市同時是府治及縣治的所在地。除非討論內容涉及縣區，否則我提到這些城市時，只會使用府名，而非縣名。舉例而言，討論廣西東南部的兩個主要城市時，我寫的是「梧州」和「潯州」，而非「蒼梧」和「桂平」。

若無特別註明，原文裏的所有譯文均出自本人之手。

緒論

1872年《南海縣志》的編者對崔贊年輕時的形象給予非常負面的評價，描寫他「性桀黠，喜功名，素無鄉曲譽」。¹〔譯按：指崔贊生性殘忍、狡猾，希望靠成就贏得美譽，但事與願違。〕崔贊的鄉里是南海沙頭堡。沙頭位於華南地區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繁榮的核心地帶，人口多達數萬，且因為有好幾個市場而支撐起當地的養蠶產業。²與19世紀中葉其他許多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一樣，沙頭居民也大量遷居外地。沙頭的崔姓和莫姓氏族後人移居海外，到達了呂宋島、越南等地。³其他人則向相反的方向遷徙，沿西江進入多山的廣西省。〔譯按：西江是珠江的第一大支流。〕例如，崔可昌在廣西中部城市潯州因木材生意致富。〔譯按：潯州為今廣西桂平市。〕他事業有成，為幾位後人鋪平了往仕途發展的路，讓他們以潯州人的身分通過科舉考試。這些事跡與榮譽都載入了《沙頭崔氏族譜》和《南海縣志》。⁴

1. 《南海縣志》，1872，卷14，頁37a-b。最後一句出自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參見Durrant et al., *Letter to Ren An*, 24。
2. 《南海縣志》，1835/1869，卷13，頁26a；《南海縣志》，1911，卷4，頁34a；卷11，頁16a。
3. 〔南海〕《沙頭崔氏族譜》，卷6，〈北叟祖潤泉房〉，頁78b；卷8，〈藹堂祖贊庭房〉，頁33b。〔南海沙頭莫氏〕《鉅鹿顯承堂重修家譜》，卷2，頁127a。
4. 〔南海〕《沙頭崔氏族譜》，卷10，〈逸菴祖月波房〉，頁28a、47b；《桂平縣志》，卷37，頁4b、49a；《各省選拔同年明經通譜：光緒丁酉科》，〈廣西〉，頁10a。崔贊的

19世紀中葉，沙頭等地的廣府人士持續循西江而上，前往廣西尋求提升社經地位的機會，但該區域的社會和政治危機卻對他們構成了潛在威脅。〔譯按：此處所謂廣府人 (Cantonese) 是指使用各種粵語方言的廣東居民，因此排除了客家人與潮汕人。〕某位崔氏婦女的丈夫加入三合會，後因1854年該組織在珠江三角洲發動洪兵起義而身亡。〔譯按：此處的所謂三合會即天地會。〕崔女在得知噩耗後自殺身亡，其貞節事跡獲崔氏家族表揚。崔家還褒揚了另一位同宗婦女，因為她在得知未婚夫加入叛軍後為了維護家族聲譽而自殺。⁵ 在《沙頭崔氏族譜》中，社會動盪不安的痕跡可說是屢見不鮮：例如，崔贊同宗近親中有三兄弟，族譜編纂者在註釋中只簡述他們「外出」，但並未說明目的地為何。三兄弟的另外三個堂兄弟，也以同樣的方式記載。⁶ 從這些措詞簡潔的族譜條目可以隱約看出，促使這些同宗族人遷居外地的大環境，或至少遷居外地的結果，與名成利就的崔可昌的情況大不相同。若這些未透露的目的地並非海外，而是西江上游，那麼可以想像他們當時要不加入了1848年在西江襲擊廣府商貿的河賊行列；要不加入三合會叛軍，並於輸掉了廣州圍城之役後往西江上游逃竄，1855年參與建立位於潯州的「大成國」。〔譯按：此政權在1864年覆滅。〕

從崔贊的傳記中，可以看到世紀中葉的戰亂及其後續發展，不僅擾亂了當年的商業格局和移民形態，也為那些在清朝統治下尋求財富的人提供了嶄新的機會。當時崔贊在沙頭已頗有地位，首先是以捐納的方式取得監生資格，往後得以參加科舉，接著在1849年的廣東省鄉試中考取舉人。三合會叛軍於1854年佔領沙頭，刻意鎖定崔家並作出攻擊，因為先前崔贊擔任「堡正」時曾逮捕過一些叛軍匪徒。⁷ 眼看家園遭大火夷為平地，崔贊只能逃往省會廣州，與其他人共組民兵。崔贊希望帶兵奪回沙頭，但不幸未能成功。崔贊戰

支族中，至少有兩位廣西生員。〔南海〕《沙頭崔氏族譜》，卷5，〈溪隱祖樸菴房〉，頁6b-7a；有關崔贊的資料，參見卷5，〈溪隱祖樸菴房〉，13a-b。

5. 《南海縣志》，1872，卷22，頁11b-12a、24a。

6. 〔南海〕《沙頭崔氏族譜》，卷3，〈溪隱祖松莊房〉，頁18a。

7. 1846至1847年，鄰近的大同鎮出現土匪，鎮上的居民便指定一位當地人擔任「堡正」。《南海縣志》，1872，卷17，頁6a-b。沙頭的「堡正」一職或許源自保正或保甲制度。Hsiao, *Rural China*, 30；Ch'ü, *Local Government*, 150。

敗後，無法離開沙頭的居民受到三合會的報復，結局悲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崔贊為何不曾在自己的家鄉獲得稱頌或表揚。⁸

在沙頭遭逢頓挫後，促使崔贊前往他鄉另圖發展。1865年會試落榜後，崔贊用米糧捐了一個州同的官位，獲派到廣西任職。此時，廣東和廣西東部各地大範圍的叛亂皆已平息，但廣西北部偏遠的思恩縣局勢仍未明朗。由於當時思恩縣知縣一職出缺，省級高層官員因此在未找到適當知縣人選前，暫命崔贊代理。〔譯按：在清朝官方的正式名稱中，這種暫時代理的官位前面都會加上「護理」兩字。另外兩種任命方式是「實授」與「署理」，兩者都是佔實缺的官員，但前者是正式任命，後者則在名義上是代理。〕撰寫崔贊傳記的作者提到，除了在旱季成功祈雨、解決了一起涉及五條人命的刑案，以及整肅州縣科試、歲試舞弊情事以外，崔贊更有效地將思恩縣的民眾組織起來，抵抗那些從貴州省邊境來襲的苗族土匪。崔贊的成就贏得了當地居民的讚揚，但他卻因此積勞成疾，在任內辭世。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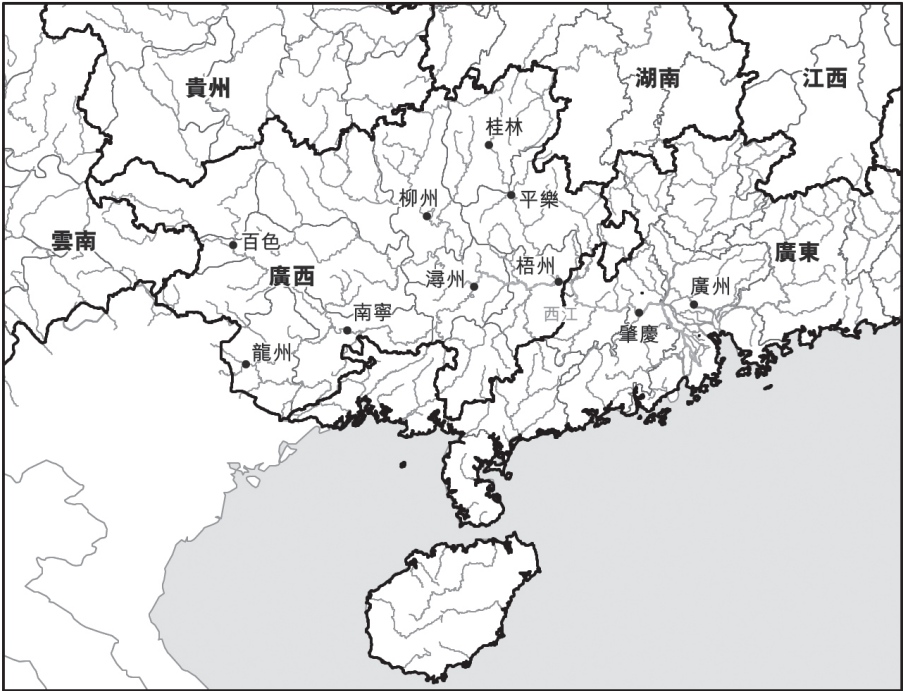
許多沙頭和附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居民前往西江上游追求財富和地位，或只是去謀生，但崔贊卻得以一雪前恥，在傳記裏從少時的「性桀黠」，搖身一變成為因戮力從公而殉職的朝廷官員。和許多故鄉在珠江三角洲的人一樣，崔贊利用往西江上游遷徙的機會，成功重塑了個人聲望。西江沿岸在世紀中葉陷入動盪，清政權到後來才得以重建秩序，雖然擾亂了當地商業活動和科舉考試（這是許多廣府男性移民能夠獲得財富和地位的兩大途徑），但在西江上游邊陲地區的移民卻也因此獲得了無數自我提升的機會。沙頭作為一個大批居民往外遷徙的城鎮、崔氏族人離開沙頭後的不同經歷，以及崔贊個人造化逆轉，為本書探討的幾個議題提供了實例。

本書所探討的最基本議題如下：19世紀中葉清廷在華南地區的統治瓦解後，到世紀末清廷在當地的政權重新鞏固之際，民眾進行大遷徙的情況如何？相關論述的地理背景是連接廣東、廣西兩省的西江流域（地圖一），而我要說的故事向來鮮為人知，與世紀中葉廣西幾次內戰和動亂密切相關。¹⁰ 本

8. 《南海縣志》，1872，卷14，頁37a-b；《九江儒林鄉志》，卷2，頁44a。

9. 《南海縣志》，1872，卷14，頁37a-38a；《直省鄉貢同年錄：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順天〉，頁34b；《思恩縣志》，卷6，頁2a。

10. 19世紀中葉的叛亂演化為內亂，有關資料參見 Meyer-Fong, *What Remains*, 11; Platt, *Autumn*, xxvii; Halsey, *Quest for Power*, 86。



地圖一：廣東和廣西

書也將討論範圍擴大，探討西江流域這個舞台上，廣府精英階層和下層社會之間經常牽涉暴力事件的互動關係。19世紀早期和中葉，精英和下層階級之間的緊張關係是本書第一部分的主題，而這個主題伴隨著20世紀初動亂再次浮現，將成為第三部分的焦點。

由於廣西是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的發祥地，一般受到學術界極大的關注。¹¹ 因此，有鑑於太平天國政權對清廷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史家往往將研究重心放在太平軍於1852年離開廣西後北上江南地區發展的動向，以及太平天國政權在大清帝國經濟心臟地帶建立政權的始末，而這當然不難理解。然而，人們對西江流域衝突的過程知之甚少，這場衝突的一方是三合會所建立的新興政權「大成國」，另一方是搖搖欲墜的大清政權，而衝突的背景

11. 關於太平天國的學術研究多不勝數，由三代歷史學家撰寫的重要英文著作分別為：Jen,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Spence, *God's Chinese Son*；以及 Platt, *Autumn*。

是在太平軍撤離廣西之後。¹² 江南居民起初將動亂視為外來勢力入侵，入侵者是來自南方偏遠地區的廣府人（粵人）叛亂集團。¹³ 沙頭和珠江三角洲鄰近城鎮的居民對這場動亂的看法則有所不同，視之為老對手之間在邊陲地區爭奪資源的戰爭。除了前述席捲珠江三角洲的洪兵起義（1854–1855，由三合會發起）曾圍攻廣州長達八個月之久以外，大規模戰鬥的場景也發生在珠江流域以外的地區，主要是在西江上游的廣西地區。此外，1854至1855年佔領三角洲大部分地區的三合會叛軍在某程度上雖說是社會邊緣人，但叛軍跟敵對陣營中效忠清廷的人士一樣都是廣府人，可能來自同一個親族或鄰里。從1840年代末期一直到1860年代，同樣出身珠江三角洲的叛亂分子和效忠朝廷者，在西江上游遠離家鄉的廣西地區中，花了很多時間互相廝殺。

因此，對於江南居民來說，太平軍的入侵代表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遭徹底摧毀，而咸豐同治年間西江流域的暴力事件，則是流域移民長期以來相互對抗的另一種表現。16世紀後期以來，廣府人（在本書中被定義為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為了營生求財而往西江上游遷徙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因此，許多廣府人在19世紀中葉加入了三合會船隊並進入廣西，或者加入一群效忠朝廷的民兵，協助追擊前述船隊，成為移民；他們沿著熟悉的水路前進，行經被來自廣府的至親熟人所長期控制的河港。換言之，遷出珠江流域的廣府人即使已遠離家鄉，但在向西江上游移動的過程中，仍然置身三角洲移民同鄉所建立的完善河川網絡。¹⁴ 此一事實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兩件事情：首先，珠江三角洲民眾往西江上游遷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會秩序的失控？其次，移民縱然離鄉背井，但他們真的與原鄉同胞完全脫離關係了嗎？¹⁵

本書的敘述和分析聚焦於那些活躍在西江流域的廣府男性以及他們與清廷之間存在的各種關係。我採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忽略其他重要的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這些積極參與的要角，包括在珠江三角洲安身立命並協助男性進行遷徙活動的廣府婦女，以及種植水稻並收穫山貨、對廣府移民

12. 關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廣西的學術研究較少，值得注意的著作包括 Laai, “Pirates”; Laffey, “Wake of the Taipings”; 以及 Davis, *Imperial Bandits*。關於三角洲的叛亂，參見 Wakeman, *Strangers*, 136–48；以及 J. Y. Wong, *Yeh Ming-ch'en*, 94–109。

13. Kuhn, *Rebellion*, 203.

14. 移民人潮是「分散於不同空間的社群」，有關資料參見 Picke, “Introduction,” 14。

15. 有關社會秩序失控，參見 Rankin, *Elite Activism*, 58；有關社群瓦解，參見 Kuhn, *Rebellion*, 69, 105。

繁榮的商業活動提供支援的西江上游居民。¹⁶ 本書更為重視的數個族群來自大不相同的背景，移民到廣西後相互競爭，例如在廣西建立太平天國政權的廣東客家人，以及為清廷效力並收復廣西的湘軍。筆者希望這種強調地域遷徙和跨地域聯繫的分析方法，將以扎根於各地區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為根據，讓我們能更細膩地了解華南的「本地」社會。

兩個多世紀以來，沙頭和珠江三角洲各個傾向往外遷徙的城鎮，持續有廣府男子前往西江上游求財。到了19世紀中葉，戰亂可能迫使（或誘使）更多男性前往西江上游碰運氣。接下來的幾十年，在廣西重新確立清廷統治的過程中，還是有更多廣府男子作出類似決定。不論是戰爭本身或戰後重建，都為男性移民提供了各種機會，在社會或經濟上也使他們得以生存，甚至茁壯，條件是這些男性移民必須願意前往西江上游地區發展並在當地久留。世紀中葉危機過後，廣府移民不僅找到了提升自己社經地位的機會，也找到了改頭換面、開創新局的契機。對於廣府男子而言，落腳西江上游地區，雖然遠離家鄉，但仍身處同鄉所建立的移民網絡中，這一向是他們可以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方式。這種重塑個人的機會在世紀中葉的動亂中倍增，而身分認同及效忠對象往往變化無常。¹⁷ 有冒險精神的廣府移民在隨後幾十年的重建時期也發現了這種機會。

太平軍北上江南地區後，西江流域這個清帝國邊陲基本上已遭忽略。我除了協助讀者了解這段歷史，也將本書置於兩個史學研究的脈絡中：第一個脈絡，主要研究戰亂中以及戰後重建時期清廷與地方精英的角色。若把這個因為漢族移入而改變的邊疆地區與江南等其他地區相較，我們會發現國家與精英之間的關係在兩處大不相同，因為邊疆地區的精英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其他地區的精英卻都是在當地扎根已久。因為戰爭和重建，這個邊陲的廣西地區歷經一段變化劇烈的時期。第二個脈絡，則是將廣府人遷居西江上游的活動置於19世紀中後期海外廣府移民（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移民）的全球背景之下。由此觀之，與其說晚清中國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不如說是一個不斷往外擴張的移民國度。

16. 有關廣府婦女，參見 Miles, *Upriver Journeys*, chapter 4；有關上游當地人，參見唐曉濤，《徬徨何在》。

17. Meyer-Fong, *What Remains*, 65.

戰爭與重建時期的廣府移民與清廷

描述咸豐同治年間內戰的歷史研究，往往著重太平軍北上江南地區的歷史；同樣地，關於這段時期以及隨後的重建階段，聚焦國家與社會關係變化的研究也大多關注江南，尤其是江南地方精英日益壯大的力量。學界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冉玫鏞（Mary Rankin）針對浙江省所進行的經典研究。她認為，在一連串動亂結束後，當地歷經了「一次決定性轉變，國家和精英社會的力量出現此消彼長的情形」。這段時期地方活動的許多領域的主動權，從官僚機構轉移到了地方精英。¹⁸ 因為各種戰後重建計劃的進行，非國家精英才有機會在地方佔據主導地位。近年的學術研究，大多著重於戰爭本身如何為江南民眾提供一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¹⁹

即便如此，不論精英或平民，戰爭和重建為這些移民提供了一系列特定的發展機會。在本書第二章，我將以西江流域上游於世紀中葉的動亂為背景，分析精英分子以及下層廣府移民有何機會尋求提升社經地位。另一個焦點是，湘軍領袖擊敗太平軍與其他叛軍，陸續收復江南到新疆西北邊陲地區的許多領土後，在各地重建清廷政權，但形式已與過去相異。²⁰ 也就是說，在戰爭和重建期間，這些來自外地的湘軍精英完全取代了朝廷勢力，而非單純利用國家資源來擴大自身的權力。²¹ 1860年代以降，湖南人與廣府移民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的關係，透過收復先前失去的領土和重建領土，重新引入國家機器。因此，在西江上游流域，漢族移民長期以來一直是鞏固清帝國的關鍵因素，廣府人士利益的重新確立和擴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強化了國家利益。這是本書第二部分（第三至五章）的主題。早在世紀中葉動亂開始之前，來自河川貿易的營收已為帝國政府在廣西的軍事控制提供了資金。²² 我想利用本書第三章，來解釋在世紀中葉戰爭期間清廷和其敵人如何越趨倚賴稅收

18. Rankin, *Elite Activism*, 3–4。最近，韓承賢將地方激進主義復興的根源追溯至19世紀初期，參見 Scunghyun Han, *After the Prosperous Age*, 14–16。

19. Xiaowei Zheng, “Loyalty, Anxiety, and Opportunism,” 74–75; Meyer-Fong, *What Remains*, 132.

20. Wooldridge, *City of Virtues*, 123–26; Schluessel, *Land of Strangers*, 48–51.

21. 白凱 (Kathryn Bernhardt) 在她有關江南的研究中指出，到了戰後時期，「精英和國家的職能及影響力都有所擴大」，參見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9, also 117–18。

22. Miles, *Upriver Journeys*, 34–36.

機制，來獲取西江流域廣府人商業活動帶來的收入。接著在第四章，我想闡述的是，隨著清政府在1860年代重新獲得此地區的控制權，廣西的廣府商業網絡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繼續擴張，甚至成為清廷歲入日益重要的來源。

除了在西江上游爭取商貿發展的機會，廣府人在幾十年的戰爭危機和重建過程中找到了其他提升社經地位的機會。在第三章，我希望探討在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初，湖南籍官員替清廷收復廣西之際，一群廣府人士如何以擔任那些湖南籍廣西官員的下屬作為跳板，進而成為清朝官僚體系在廣西的底層官員。到了19世紀末，廣府人在廣西的清朝省級行政體系中為自己創造了極大的優勢，他們大量出任基層官員，包括知縣和官員的幕賓，尤其是候補文官和縣級以下的行政人員。同樣的，隨著清廷在廣西重新建立科舉制度，大批廣府人士把握良機，先在廣西各地官學當上監生，繼而於該省獲得功名，而這也是第五章將談到的議題。透過擔任省級官員並獲得功名，廣府男性移民協助將清朝體制重新引入廣西。在18世紀，因為朝廷積極掌控廣西，導致廣府男子無法大量擔任該省行政人員；到了1760年，廣府籍移民在廣西獲取功名的機會更是大受限制。²³ 相對而言，19世紀中葉動亂後，朝廷因為必須依靠湖南人和廣府人收復廣西而態度丕變，允許移民群體以較為靈活的方式成為廣西省政府的官員以及協助管理國家的科舉制度。²⁴ 因此，對於西江流域上游的廣府精英來說，與朝廷相關的資歷仍然是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資源。²⁵ 許多廣府人透過往西江上游遷徙，獲得了國家權力的象徵，包括官銜、國家的任命和科舉功名，以成為朝廷在當地的代理人。然而，這些移民也藉此提升了自己的社經地位。

對於地域流動性太高的情況，19世紀中後期的清廷也許仍有所疑懼（尤其是流動性高的下層階級），但清廷在廣西恢復統治，所依賴的是往西江上游遷徙的軍人、民政官員、商人、學生和其他珠江三角洲的居民。²⁶ 此外，也

23. Miles, *Upriver Journeys*, 54, 100–103.

24.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117.

25. 有關浙江，參見 Rankin, *Elite Activism*, 15, 20；以及 Zheng, “Loyalty, Anxiety, and Opportunism,” 75–76。為了在戰後重建「威信」，「國家權力機關採用了不同機制及展現方式」，有關資料參見 Meyer-Fong, *What Remains*, 165。有關重建時期的國家建設，參見 Wooldridge, *City of Virtues*, 130, 149。

26. 有關國家對地域流動性的疑懼，參見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100。

許廣府移民經常以富有創意的的方法操縱朝廷機構以謀取自身的利益，不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清廷鞏固邊疆統治的計劃與廣府移民希望提升其社經地位的目標相輔相成。²⁷ 而這些計劃和目標，自16世紀末以來完全改變了西江流域上游的局勢。19世紀中葉在廣西發生的戰爭，曾嚴重威脅清廷省級行政機構的存續以及廣府人士建立的河川商業，但出人意料的是兩者都得以迅速復原。19世紀末，清廷恢復了對廣西的統治，廣府移民的河川商業獲得空前的發展機會，大肆擴張。

廣西省挑戰了清廷統治，甚至一度危及朝代的存續，但這前所未見的危機結束後，廣西又被重新納入帝國版圖。與此同時，廣西在經濟和文化上與廣東省（特別是與珠江三角洲）的聯繫更形緊密。我將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探討這些議題。中國西南疆域在19世紀末歷經了這種整合程度提升的經驗，且令人意外的是，這種整合在當地普遍存在，但卻未發生於帝國的其他地區。²⁸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曾論及黃河和大運河交匯處如何從19世紀末開始成為經濟邊緣地區，原因是新的運輸科技使運河交通不再風光，而且朝廷也不再將資源投入該地區。²⁹ 相較之下，沿著極其順暢的西江航行，新科技和通商口岸的開放強化了當時廣府人士建立的商業網絡。³⁰ 此外，許多廣府人歡迎朝廷恢復對廣西的統治，因為國家提供的資源可以用來保護商業，通過科舉制度可以獲得功名，並在該省的衙門當官。因此，19世紀中葉的戰爭和不斷變化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加快了西江流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讓當地得以跨越世紀中葉因為戰亂而造成的鴻溝，進行各種重要的持續性發展。可以肯定的是，廣西過去曾經是、而未來也必將是珠江三角洲經濟和文化核心的周邊地區，但正因如此，加強區域一體化符合許多廣府人城鎮、社區和家庭的利益。所以，在相當大程度上，廣西透過與珠江三角洲的橫向整合，在縱向上重新與清帝國的中心連接。³¹ 在某種程度上，本書所探討的正是清帝國

27. 有關明朝臣民為了私利而操縱國家政策的方式，參見 Szonyi, *Art of Being Governed*, 15, 84。

28. 例如，19世紀中葉的戰爭導致四川鹽巴貿易出現調整，有關資料參見 Zclin, *Merchants of Zigong*, 81–84；此外，有關新疆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政治統合，參見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132–33。

29. Pomeranz, *Making of a Hinterland*, 122.

30. Pomeranz, *Making of a Hinterland*, 124.

31. 白莎 (Elisabeth Kaske) 指出，太平天國滅亡後，各省區之間的橫向關係相當重要。參見 Kaske, "Fund-Raising Wars," 73, 77。

的重新融合，朝廷對上游邊疆地區恢復統治的過程，以及伴隨上述兩個趨勢而來，且持續不斷崛起的廣府移民人口。

上游及海外：全球背景下的廣府移民

19世紀中葉以後，廣府移民不僅離散於華中地區開放不久的兩個通商口岸（漢口和上海），還外移到日本、東南亞、澳大拉西亞、美洲以及歐洲。³²不過，本書聚焦研究的廣府人則是活躍於西江流域，他們不僅移民時間最早，且佔整體廣府移民人口的比例也最高。接下來的幾章我將會闡述廣府人的兩道遷移軌跡（遷往西江上游，抑或移居沿海和海外），並指出這兩道軌跡之間的關聯和相似之處，藉此嘗試把中國歷史置於全球脈絡下——但我書寫的對象是廣府移民這個離散社群，而非清朝舉國之事。³³

太平軍離開廣西，北上發展後，當地的歷史便一直默默無聞。同樣的，在19世紀下半葉的「大遷移時代」，中國境內的遷移活動也大多遭受忽略，不如海外移民那樣備受矚目。³⁴不過，最近有關海外華人的學術研究卻開始強調，刻意去區別境內和海外移民其實並無太大意義。事實上，如果從家庭、社群策略以及共有的體制看來，境內與境外移民這兩道軌跡往往是緊密關聯的。³⁵在珠江三角洲，上游和海外的軌跡主要由特定家族和世系聯繫起來，上述崔氏一族就是個好例子；次要的聯繫則是個別社群，例如沙頭。九江鎮是南海縣境內另一個重要的移民地區，該地臨近沙頭，同樣位於西江北岸。〔譯按：此一九江並非江西省的九江市。〕19世紀中葉，九江居民從廣西進口大米和捕獲魚苗，當地養魚業更因此名揚四海，兩地經濟可謂緊密相連。³⁶

32. 有關這些地區的廣府移民，參見 Rowe, *Hankow*, 229–30；Goodman, *Native Place*, 59–62；Eric C. Han, *Japanese Chinatown*, 10–11, 42；Reid, “Mining Frontier,” 33；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53, 66–67；James Ng, “Sojourner Experience”；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Hsu, *Dreaming of Gold*；以及 Benton and Gomez, *Chinese in Britain*, 32–33。

33. 有關19世紀清朝歷史的比較，參見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以及 Halsey, *Quest for Power*。

34. 值得注意的是，漢人移民至滿洲的學術研究為數不少，其中不少人是從山東越洋前往當地。參見 Gottschang and Lary, *Swallows and Settlers*；Reardon-Anderson, *Reluctant Pioneers*。

35. 例如：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65；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4；Pieke et al., *Transnational Chinese*, 23；Pieke, “Introduction,” 2；以及 Miles, *Chinese Diasporas*, 24–26。

36. Miles, “Upriver Reach,” 164–65；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207–12。

九江商人在越南也相當活躍，他們本已在西江通商，自然想將事業擴張至越南。³⁷ 19世紀末，九江移民的地點擴大至古巴和墨西哥。³⁸ 到了1900年代，一份用英文撰寫的西江旅遊指南提到，九江有不少居民「曾在美國和澳洲生活」，他們從那裏「帶回了國外的思想」。³⁹ 19世紀期間，雖然廣府人的海外移民地點急遽擴大，但上游流域固有和新增的移民地仍然吸引了不少九江等地的居民。

長久以來，九江、沙頭和珠江三角洲其他移民社群不斷遷往上游地區，可謂發展出一套當地的移民文化。對於珠江三角洲特定的家族、世系以及社群而言，輸出男性勞動力已是維持和提升社會經濟地位的策略。換言之，移民成了某種謀生之道，年輕男子必須離鄉背井到外地打工，為家庭經濟作出貢獻。遷移到上游地區的廣府男性在各種合法與非法行業中幹活，他們的職業包括：科舉考生、長途貿易商人、商業代理人、店主、流動小販、工匠、體力勞動者、騙子以及強盜。以往男性移民者的經驗為社會帶來了期望，也讓年輕一代掌握上游地區的機會，早期的移民成果可謂促成了日後的移民。此外，有了家庭和社群的移民慣例，移民者面對其他地方的新機會時也能迅速佔有優勢，這解釋了為何在19世紀下半葉，上游地區和海外的移民鏈能同步且持久地建立。⁴⁰

大遷移時代發生在晚清，移居海外的華人中，廣府人以及廣東和福建各地的居民或方言群體（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建人）佔了多數。本研究顯示，有不少廣府村落、世系以至家族內都有移居到上游地區和海外的成員，這有助我們理解19世紀中後期移民的範圍和原因。據學者亞當·麥基翁（Adam

37. Miles, "Upriver Reach," 165–66.

38. López, *Chinese Cubans*, 101, 169, 172; Romero, *Chinese in Mexico*, 1, 47, 72; Schiavone Camacho, *Chinese Mexicans*, 105, 108, 110. 根據「九江」的粵語拼音（Jiujiang）以及我對當地常見姓氏的了解，無論是羅梅羅（Robert Chao Romero）寫的 Kow Kong、Kiukon 和 Jiu Jang，還是絲嘉沃妮·卡馬喬（Schiavone Camacho）寫的 Kaw Kong 和 Kau Kong，我幾乎能肯定他們指的就是九江。

39. 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 *Handbook*, 12；另參見 Choi, *Hybrid Maritime World*, 91。

40. 有關地方移民文化，參見 Picke, "Introduction," 8, 16；有關社會期望，參見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76；有關廣府太平洋移民的抱負，參見 Henry Yu, "Mountains of Gold," 111–16；有關廣府家庭的「勞動力輸出習慣」，參見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37；有關移民帶動日後的移民活動，參見 Picke et al., *Transnational Chinese*, 61–62。

McKeown) 估計，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大遷移時代的高峰期，每年每 1,000 名廣東居民中至少有 9.6 人移民海外。⁴¹ 麥基翁估測時所使用的移民數據，並不包含中國的境內遷移，例如從廣府地區搬至上游地區的人數。外省移民主要為遷至廣西的上游移民，也包括移往上海的沿海移民。就本書接下來幾個章節提出的質性證據可看出，若把外省移民計算在內，廣東每年的長途移民率將大幅提升。

對於中國人（特別是廣府人）在 19 世紀中葉的移民背景，過去的學者往往強調社會動盪和貧窮問題是把他們「往外推」的因素。研究海外移民的學者們認為，鴉片戰爭（1839-1842）和包括太平天國在內的國內民變是社會動盪的根源，導致人民移居他方。⁴²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把 1850 年代西江上游地區的三合會活動歸因於一系列類近因素。⁴³ 某種程度上，三角洲的社會動盪確實導致人們在 1850 年代移民海外及上游地區，因此兩者都該歸類為同一廣泛現象的一部分。然而，陳勇在研究移民至加州的廣府人時，卻淡化了這種推理因素，並主張廣府人之所以選擇移民離開三角洲，與其說是他們決意擺脫貧窮，不如說是為了提高社會流動力的精心策劃。陳勇強調廣府人移居海外前，在家鄉社群中獲得的創業經驗和知識相當重要。⁴⁴ 海外移民或許還借鑑了上游移民的經驗。正如我們所見，移民活動已經滲入珠江三角洲不少家族和社群的社會架構之中。

從移民的角度而言，無論是上游地區還是海外，無論是投機主義抑或孤注一擲，無論是主動或被動，晚清都稱得上是廣府人離散擴張的時代。⁴⁵ 本書內容集中於上游的移民軌跡，而這只是初期廣府人移民全球各地的一部分。透過其他重要的軌跡，廣府人沿著中國海岸移居上海，跨越水陸遷往越南和東南亞各地，也飄洋過海到了澳大拉西亞、美洲和歐洲。從這個角度來看，晚清中國的歷史顯得截然不同。19 世紀中期的戰爭和餘波帶來了暴行和社會衝突，即使把這一切考慮在內，本研究所顯示的既不是一個腐朽帝國，

41. McKeown, "Global," 160.

42. 例如：Mei, "Socioeconomic Origins," 474；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111。

43. Wakeman, *Strangers*, 126-27.

44. Yong Chen, "Internal Origins," 545-46; Yong Chen, *Chinese San Francisco*, 12-14. 另參見 Hsu, *Dreaming of Gold*, 11；以及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66。

45.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198-99.



地圖二：珠江三角洲

也不是一個正在衰落的中華文明，而是中國一個地區和方言次群：這個群體顯著地擴大了其活動的地理範圍，過程中不但改變了自己位處的珠江三角洲（地圖二），最終還改變了越來越多廣府人遷往的各地社會。⁴⁶ 西江上游流域覆蓋廣西大片面積，是廣府人的移民地之一，當地與廣府人的融合度比其他任何移民地都要來得堅固。此外，雖然廣西受到清朝帝國的統治，但正因清廷的存在，相較在海外，廣府移民在上游地區重塑自我的方式更為多樣。⁴⁷

46. 19世紀中後期崛起的另一個地區群體為湖南人。見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47. 一個世紀後，福建人有可能改變他們在「跨國社會空間」中的社會角色。有關資料參見 Picke et al., *Transnational Chinese*, 163, 168。

西江的謀生之道：地理概觀

何世文遷往上游地區後成功重塑自我，他享受著朝廷特許的壟斷經營權，專門把鹽從廣東沿海運至廣西市場販售。19世紀中期戰爭爆發前的幾年裏，何世文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上游流域，不但日進斗金，還書寫及傳播自己的記遊詩，利用他在廣西的遊歷來累積文化資本。他把其發佈的詩歌輯錄成兩本詩集，分別是1838年出版的《安所遇軒僑西稿》以及《安所遇軒西遊草》（此書有一1864年重印的版本流傳於世）。為了讓《安所遇軒僑西稿》更具文采，他還找到珠江三角洲的文人題詞，甚至把其中幾首詩刻寫在廣西的自然地標上。藉著書寫和出版詩歌，這位旅居外地的商人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廣府文人。

何世文出身於南海縣的一個村莊，那裏離九江上游不遠，後述章節將討論一些他曾到訪之處，其詩歌和石刻文字都可以作為我們了解西江流域的指南。⁴⁸許多廣府旅人從珠江三角洲出發後不久，都會途徑九江鎮南方不遠處的順德縣甘竹溪，何世文亦在詩集中收錄了一首有關甘竹的詩。⁴⁹在西江的南岸，也就是順德以及南海對面，何世文途經新會、鶴山和高明等縣，然而他並沒有注意到這些地點。研究廣府人移居海外的歷史學家認為，新會為西江以南的四邑之一，與西江以北的三邑，也即是南海、順德以及番禺形成對比。我找到的歷史資料之中，沒有任何一項顯示四邑和三邑於上游移民活動中有顯著區別。兩者同樣坐落在西江之上，比起遠離江水的家族和社群，西江兩岸的家族和社群大概有更多相同之處。

何世文遷往上游時，創作了《阻風於羚羊峽》一詩。此一峽谷位於肇慶府治南方，把珠江三角洲和上游的山脈區域分隔開來。他在詩中書寫了一位廣府妻子等待外移丈夫歸來的血淚辛酸。⁵⁰根據當地傳說，這位貞潔的妻子最終化成了「望夫石」。經過肇慶市後，何世文越過省界進入廣西，很快就到達商業中心梧州。前往梧州的路上，他還途徑了西江上的小島繫龍洲，並於其創作的四首詩歌中附加說明，以解釋梧州的地理意義。梧州位處灕江和主幹流的交匯處，灕江江水從廣西省會桂林向南流入，而主幹流則從潯州向東

48. 《南海縣志》，1911，卷19，頁11a。

49.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3，頁4a。

50. 何世文，《安所遇軒僑西稿》，卷1，頁3a-b。

匯入。〔譯按：1950年，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省會則從桂林遷到南寧。〕何世文在其中一首詩中提到「畫舫」上的「女伴」，影射招待河上旅人的性交易產業。⁵¹ 在平南縣，他寫下了《夜泊》，隨後又在潯州府治桂平縣寫了《途中》一詩。⁵² 在潯州，遊人可以從某條支流越過象州的急流，然後前往木材貿易中心柳州。⁵³ 1842年，何世文在柳州立魚峰上題詩時，將這座位於西江上游的岩層與自己家鄉南海附近的西樵山洞穴相提並論。⁵⁴ 從柳州再往上游走，何世文到達清遠府的府治宜山縣，並哀嘆自己未能渡河遊覽對岸的山脈，不然的話，他將會看到不少明代（1368–1644）官員和文人的石刻遺跡。⁵⁵

回到潯州，廣府旅人一般並未向西北方前往柳州，而是往南越過寬闊的河谷進入貴縣，那裏是三角洲市場中最大的廣西米生產地。貴縣以南有一脈喀斯特小山，其中有一座佛教寺院南山寺，何世文1844年在寺內刻寫了一首詩，並表示自己當時是在重遊舊地。⁵⁶ 之後，他繼續沿河而上，途經廣西南部的南寧，然後前往田州，當年那裏仍然實行著土司體制，但廣州的土官數量已日漸減少。何世文在田州活動了幾年，其間曾冒險前往百色廳至少一次——那是一個位於廣西西部邊陲的小鎮，當時正迅速發展成廣府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1844年，一名清廷官員受命維護田州和百色廳之間的通道安全，何世文為該名官員寫了一首離別詩，稱讚他「消滅」了在當地橫行霸道的「大批土匪」。⁵⁷ 何世文以為朋友於清朝官僚制度下能輕易掃除土匪，這種想法未免過於樂觀。接下來的章節將展示，到了1840年代末期，四處流動的下層社會已變得越來越狂暴。

何世文與友人的題詞中，不少用語都傳達出一種在河川網絡上移動的感覺。1833年，何世文返鄉探親後出發前往廣西，當時他在廣州的一位熟人寫

51.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2，頁10b–11a。

52.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1，頁2b–3a。

53. 有關象州的急流，參見何世文，《安所遇軒僑西稿》，卷1，頁15a；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3，頁3b–4a。

54. 何世文，無題詩，1842；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3，頁8a。

55.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3，頁8a；筆者田野筆記，廣西宜州會仙山，2012年7月4日。

56. 何世文，無題詩，1844。

57.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卷2，頁6b；《清代縉紳錄集成》，第17冊，頁180。

道，何世文「又解纜西行」。⁵⁸他在廣西寫的幾首詩都是以自己與廣東同胞相聚或離別為主題，其中一首詩就是送人「東歸」。⁵⁹提到上游活動對三角洲生計的重要性的文獻並不多，當中有一篇題詞，其作者的好友馮日初出身南海沙頭鎮，與何世文同為南海縣文人，並「旅食西江」。馮日初是沙頭鎮的地方首領，他於1841年在當地集資建立了米市。此外，馮氏於1846年在廣西東北部富川縣為朋友的詩集寫了序言，可見他也在上游待過一段時間，有可能從事鹽業貿易。⁶⁰這些詩歌和題詞揭示了廣府人的精英網絡，他們共同在西江遊歷以求謀生。這種策略不僅限於富商和充滿抱負的詩人，而是橫跨所有社會階層的廣府男性，涵蓋精英至底層，成為普遍現象。下一章將開始探討這個問題。

58. 何世文，《安所遇軒僑西稿》，後記及序言，頁14a。

59. 何世文，《安所遇軒僑西稿》，卷1，頁18a。

60. 何世文，《安所遇軒西遊草》，證詞，頁4a；鄧翔，《知不足齋詩草》，序言，頁1a-2a；《南海縣志》，1911，卷6，頁47b。馮日初在富川鹽庫所在地古城鎮寫下了這篇序言，見《富川縣志》，卷12，頁12a。

麥哲維 (Steven B. Miles)，現任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傅珮琳，現就讀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

袁曼端，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畢業。

陳榮彬，現任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危機中現轉機

晚清廣府移民與國家

「在整本書中，作者善用了廣東和廣西兩省的族譜、縣志和碑記，重建了具說服力的傳記，生動而有說服力描繪了各傳主的生平、他們的遷移過程、事業軌跡及個人轉變。」

—王靈智，《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通過對華南地區前沿的考察，《危機中現轉機》為清代社會史的未來研究提供了一個模型，並提出了啟發性的分析，打破了我們對中國移民史的既有地理概念和互動性。本書仔細地分析 19 世紀中國的暴力與身份認同，並利用豐富的實證數據探討了有關階級和身份認同的更廣泛議題。」

—許臨君 (Eric Schluessel)，《社會史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封面圖片：從灘江西岸遠眺梧州，背景是西江和繫龍洲，標題為「鳥瞰梧州與府河」。
攝於 1890 年代，在 SS *Wing Tong* 號輪船前往梧州途中。收錄於〈西江風景〉，
《香港照片影集》第 6 冊。照片提供：英國國家檔案館。

中國歷史 / 移民研究

ISBN 978-988-8876-94-5



9 789888 876945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s://hkupress.hku.hk>